

人文中国学报丛书系列

1 9 5 0 - 2 0 0 0

邝健行 吴淑钿 编选

香港

中国古典文学
研究论文选粹

小说·戏曲·散文及赋篇

江苏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粹(1950—2000)·小说、戏曲、散文及赋篇/邱健行,吴淑钿编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4

(人文中国学报丛书系列)

ISBN 7-80643-117-9

I. 香... II. 邱... ②吴... III. ①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文集②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国—文集③古典散文—文学研究—中国—文集④赋—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8833号

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粹(1950—2000)

小说、戏曲、散文及赋篇

- 著 者 邱健行 吴淑钿 编选
责任编辑 冯保善 王华宝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雯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大32
印 张 16.75
印 数 1—2500册
字 数 420千字
版 次 200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117-9/I·38
定 价 26.00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吴淑钿

为香港五十年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作点算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事实上在较早的时候,我们甚至认为这是近乎不可能的事。然而努力多年,信心就在资料累积中建立起来了,今天我们已掌握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资料库,显示自1950年至2000年香港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我们将其中一部分以《选粹》的形式纪录下来,作为香港过往特殊历史阶段的文化表征之一。

一、《选粹》缘起及资料定位

我想在这里先交代一下《选粹》的缘起。1998年起我与邝健行教授在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拨款资助下,开始一个名为“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出版资料辑(1950—2000)”的研究计划,主要是希望透过整理已然分散或行将湮没的一批资料,显示过去五十年香港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情况。由于资源与篇幅的限制,计划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搜集资料的范围是“古典文学通论”、“诗词曲”、“散文、骈文及赋”、“小说”和“戏曲”等各部分,第二阶段则以“诗经”、“楚辞”和“文学批评”为主。两阶段的计划于

2002年完成,历时四载。研究计划以出版资料为划定对象,是因为以人为单位的话,全面的研究资料追踪无从,早期香港学术界流动人口颇多,很难为“香港学人”的身份属性下一定义;又因学术刊物出版园地有限,学者的研究成果往往外投者众,造成纪录的隐蔽,要准确统计香港学者的研究资料着实不易。故我们选择最客观的做法,就是凡出现于香港出版资料中的作者,无论其为大陆、台湾或海外的身份,皆广义地定位为香港作者,他们的论述都被纳入资料库中。当然在对资料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会就所知现实情况,将视野尽量放在香港本土作者的研究上。我们认为将香港出版资料作为主要线索是最可行的一个方案,一俟完成了这骨干部分的汇辑工作,再尝试在资料库中补充学者其他发表在外地的资料,便大致可达预期的终极目标了。无论如何,整理古典文学研究资料以至选粹出版的目的,是为突显香港某一时空的集体文化努力成果,虽未能呈现每一专家学者整体的终身学术成就,甚至一斑之窥也谈不上,但作为地区性的一种学术纪录,它仍是有非常重要的存在价值的。

二、“汇辑”及《选粹》的意义

《选粹》是以“汇辑”的工作为基础,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出版资料的汇辑是一项极富意义的文献整理工作。过往五十年,香港经济飞跃发展,教育普及,社会文化程度日渐提高,对传统中国文学的认识以至研究高度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由于长期受殖民统治,西方社会思想影响甚深,英文的使用能力或英文修养的好坏往往是这里判断一个人文化水平的准则,那也是青云路的重要阶梯。相对之下,中文也就不可能成为语文教育的核心或宠儿,所谓中英并重,其实是有明显的主次之分。但尽管如此,在华人占

一般文化主导的香港社会中,中文仍有最大的生存空间和相当的水准,这与民族本身的血缘体认固然有关,亦与教育工作者的本位执著有关。将古典文学研究的出版资料整理出来,其结果是显示了殖民社会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归心理。

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早期政治动荡,不少学养精深的人南流此地,带动了中國思想文化的传播,他们在这里办刊物、办学校,使中文教育的种子更植根深厚。到了20世纪70年代,政府在中学将中国文学自语文科中分离出来,另设一科,从文学教育角度说,是使之普及与正规化了。对大学的中文系来说,这则是一支强心针,让有文学基础的学生可以及早知所适从,和决定研究方向。我们在五十年间香港研究古典文学的出版资料中,可以见到的现象,是自60年代开始,大专院校的学生刊物中便不乏研究成果的发表,七八十年代尚维持持续出版的局面,至90年代,情况逐渐改变,一方面是学生的刊物少了,一方面是他们的论文经典化了,真正挤入学术的殿堂,由大学中文系代为出版,代表的不只是一个出版园地的花朵,而更是一个学术机构的教研果实。

50年代以后,特别是六七十年代,国内古典文学研究受政治意识形态主导,情况跟海外很不相同,海隅的香港遂成为另一个出版的天空。70年代对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反响便显示了这方面的特点。这也是我们保留大量外地作者的香港出版资料的原因,它们弥足珍贵,散发着既是边缘又俨似中心的历史光辉。从期刊的时序资料看,六七十年代是香港民办期刊最活跃的时期,载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的一共有卅余种,80年代以后便明显减少了,90年代后更少,目前相关刊物估计只有三种。如果说这类刊物的出版使命已经完成,或者说这类刊物已全然没有了生存空间,则过去五十年来这些刊物中的研究资料便不容忽视,因为它象征一个历史时期的声音,一个特殊时代的雅言。

在香港,学术研究的自由度很大,可参考的资料也很广泛,没有过去海峡两岸各受制肘的局限,我们可以见到所有地区的学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成果,占学术资讯之先机。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华人学者亦乐于在香港的学报上发表他们的研究心得,故从交流的角度说,这些学报中的研究资料甚具“国际”价值。如《红楼梦》研究便一度使香港成为论坛的中心,无论索隐、考证或文学批评各派学者的研究都出现于此间刊物上,论争极一时之盛。以学报及期刊为主的出版资料显示了香港具有包容性的研究特质,研究风格不局限于单一性。又早年的学院研究文章有些是属于结合教学的讲义式叙述,七八十年代后,讲义式的研究份量减少,论辩性的成为主导,象征新一代教研者治学模式的变化。近年大学的学报有增加的趋势,也就让学者有较多的发表良机,有助促进研究风气。将历年学报、期刊及论文集等的研究资料辑纳整理,使后学开拓视野,不致原地踏步,最具学术意义。

故无论从社会、教育、时代和学术各方面言之,汇辑香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出版资料都具重大意义,这是我们构思这个研究计划的主要动机。研究工作刻不容缓,是因为香港社会在世纪之交面临大变迁,政治上的回归意味语文教育的重新思考与调整是一个热门课题,资讯科技的飞跃意味传统文化可能被加速淡忘。我们觉得在这个时刻回顾过去此地有识之士对古典文学的倾心与热诚,既呈现了五十年来香港社会的艺术文化审美心理,也树立了一个历史的典范,可对后学起鼓励作用。在母语教学与民族情结尴尬纠缠,在影像操控凌驾书本阅读的绝对趋势中,所谓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其实已气息甚弱;如何在美丽的文字世界中见出精微学问,我们的资料库及时向世人展示了答案,而将资料库中具象征意义的研究成果选粹出版,是落实一个时代一种声音。

三、整理“汇辑”的过程及结果

过去四年,我们搜集了丰富的出版资料,建立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资料库。库内收有总资料近四千种,包括专书和搜辑自九十余种期刊学报的论述文章,还有早期本地报章副刊上的讨论。资料仍在不断增收中。

在资料处理的过程中,我们常遇到不少困难,例如类别划分的问题。从古典文学资料本身说,所谓四文类,其实是清末以来受西方文学分类影响而确立,中国古代文体分类较广泛也较繁琐,又中国文人通艺文者往往不限一隅,或文史不分,或诗文兼精,或批评创作结合等。如何在作品资料或作者资料上作清楚归类都是一线或一念之别。至从研究古典文学的资料说,有些属严肃学术论文,有些属漫谈性质,有些在序跋中含见地,有些在书信中谈学问,有些属笔记形式,有些由笺注见功力。要将某部分切除,都易有所见遗,故资料库将所有能显示作者研究心得的作品都辑纳起来,让搜集资料者自己作出去取。

观乎过去五十年间香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从资料库的分部看,专书出版以诗词曲部最多,其次是小说部、文评部、戏曲部、散文等部、诗骚部。散篇论述文章则依次是诗词曲部、小说部、文评部、诗骚部、散文等部、戏曲部。断代文学研究期刊资料以清代最多,主要是《红楼梦》效应,其次是唐代、先秦、宋代、明代和魏晋南北朝。至于五十年间的篇章资料比重,以60年代最盛,然后依次是70、90、80年代,50年代最少。各范围的研究尽管份量有多寡,成绩亦各有参差,但总的来说是代表了这一个世纪里头香港对中国传统文化最直接的体认,体认的方式是以文字为工具,以论述为形式,以古典文学为内涵。在大学的图书馆中,固然仍藏有不

少从未出版或在外地出版的高等学位论文,可显示香港古典文学研究的专门成就,但这批沉埋及外流的资料既暂未能全面掌握,则我们庞大的资料库便充分发挥了代言的功能。90年代以后,香港古典文学研究逐渐脱离一般社会文化阶层,走入高等学府,成为象牙塔内的专利品,在精深之处固然可等视同侪,使此地成为重要的学术领域之一;但没有普及文化刊物中浅白的介绍或引导文章,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既走在一条阳春白雪的道路上,又全然欠缺群众教育基础,便是失却了广大的后学培训场域。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指出,香港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上是曾作出了历史贡献的。这不只是量的问题,也是质的呈现,为了保存及推广这些珍贵的资料,我们决定选择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章出版,作为“汇辑”计划的圆满结果。

四、出版《选粹》的原则、价值与展望

能以《选粹》的形式纪录50年代以来香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大体面目,是我们对这次出版的最大期望。我们并没有建构香港古典文学学术史的初衷与野心,但相信已稍微具现了这样的一种意义。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不能转载专书部分的资料,只能选出部分篇章,包括学报、论文集及期刊中的文章,前者主要是具论述规模的学院式论文,后者则选期刊中比较严肃的短篇论述。所谓有代表性,当然是以具价值的作品为前提,然而要在五十年的资料中树立一个划一的去取标准,便容易失了特定时空的“发展”意义。因为不同时期的研究风格有不同表现。例如从论述规格言之,虽是时代越往后而越专精,但我们却不能说早期的研究不如当代;早期学者的论述文章,蕴含着博大融通的学问,是孕育后学的营养取给所。后来者论述方式的渐趋精密,则是事物进展的必然

结果。有本始有实,若将《选粹》重心只放在八九十年代是不切实际的做法。再者从论文写作言之,不同研究主题有不同的表现特点,各师各法,建立一绝对标准是比较困难的事。故在选篇的时候,作品素质是首要考虑的问题,此外我们也参考一些客观的原则,例如重要的学者,重要的学报刊物,本地学者的专研范围,研究方法的角度与特色,文类各部篇章数量的多寡,某时期的学术讨论重心等等,都费斟酌。上述原则皆为使《选粹》能达致其主要功能,呈现五十年来香港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概况。

《选粹》的篇章,起码包括了香港三代学人的研究结晶。数十位作者中,主要是本地脉流的学院派学者;五六十年代师承饶宗颐教授、潘重规教授及周法高教授等的第二代学人,今日已由第三代传承所学,并展开了第四代的培育梯次。非本地学院脉流的作者在《选粹》中亦占重要位置,他们都是过去或现在长期对本地中文学术作出贡献的学者,如钟玲教授和吴宏一教授。此外也有学术岗位以外的作者,他们有些是中学教师,有些是文化界人士,都曾在本地图物上发表研究或讨论学术问题,要亦出身香港院校,或曾长期在港从事文化工作,如姚道生先生和胡菊人先生等。如前所云,香港学人的身份既难一律定位,则《选粹》便没有显示香港中文学术圈结构图的使命,所以我们广义的概括了不同层面的作者的研究资料,主要以资料为本位纳入作者。

考察《选粹》篇章的研究方法,有用传统的知人论世法讨论问题,有对作者的生平事迹作考辨,有对文献资料作索隐或搜遗,有由历史、音乐或哲学角度讨论文学,有以西方文学理论解读深究作品;有印象的说明,有体裁的专论,有理论的建立,也有批评的再批评等等。要之,各论所长,识见纷呈,充分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专研范围上突出香港作为中西文化荟萃的国际都会特色,对传统文化作出了值得珍视的贡献。

出版《选粹》除了落实“汇辑”、呈现资料的集体价值外，其实也希望产生一种推广与联络的作用。长期的客观因素使中文学术领域一直陷于地区分割局面。到目前为止，资讯虽发达，研究成果的无疆界分享尚是美梦阶段，将来或会有打通所有出版关节的一天，但过去人们做了些什么，起码过去的学者在香港曾作了哪些努力，国内外学界并无清晰印象。藉着《选粹》，以及理想中将来可继续出版的总目录，我们便与他们联系和接轨了。在国内出版的好处，是读者群最广大，而且可反销本地，流通海外，达推广的极佳效果。

我们希望藉着《选粹》，让各地学者知道香港在古典文学研究上的学科成就，在各相关专研范围里得所参考，开辟视野，更对本地后学起鼓励作用，期望中文学术研究有乐观前景；而最重要的，是在当前香港社会及管治大学阶层一片忽视人文学科声中，引起有识之士文化良知的思考。

做“汇辑”以至《选粹》的工作，一直得到各方的支持与鼓励，其中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两次拨款资助研究计划让我们可实践建立资料库的理想，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热心推荐使出版《选粹》竟成其功，本系宗静航老师协助向《人文中国学报》申请资助出版费用，学报编辑委员会通过拨款，各篇章作者或家属弟子惠允版权，都是要衷心感谢的。当然漫长的辑选岁月中也不是绝无反面意见的。在申请香港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研究计划的时候，我们从退回来的评审意见中，读到令人非常泄气的批评，评审诸公中有人认为香港根本没有研究成就可言；评论用英文写成，翻译为中文，大意是这样：此等无用之文，早应弃如敝屣，何须竭力存留？（“Why spend time and money to save mediocre or worthless works from their deserved demise?”）抹煞了几代人的努力。

邝健行教授是这个辑选计划的最初构思者,多年来他经常在学术上给我指导,于此深致谢意。同时也谢谢两位研究助理冯筱然与谢淑香。

体例说明

- 一、《选粹》全书分三册，第一册《诗词曲篇》，第二册《小说、戏曲、散文及赋篇》，第三册《文学评论篇》。
- 二、作者身份以曾在香港长居、讲学专上院校及从事文化事业者为主。
- 三、由于篇幅限制，本书的选篇原则是一册中每位作者的论文不逾一篇。
- 四、各篇文章符号尽量统一，原稿如有明显误植之错别字，则代为更正，其余一律依从原稿。
- 五、文章排列次序以发表年代先后为据。

小说、戏曲、散文及赋篇序

吴淑钿

《选粹》的“小说、戏曲、散文及赋”部分共选了二十三篇论述文章。小说最多,占十一篇,戏曲次之,共七篇,散文及赋则只有五篇。由于受编选规模的限制,总辑录字数比“诗词曲”部分少了近十万字,但并不意味这几种文类过去缺乏专精研究成果。

从资料库的统计数字看,香港在过去五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出版资料中,小说部的份量仅次于诗词曲部,专著与散篇近九百种,约半属清代的主要是《红楼梦》的研究,各时期中又以70年代占去三分之一的出版篇幅,其次是80年代,60年代和90年代相若。

从时序看,香港由60至90年代其实都维持着对小说研究的相当热衷,每一个十年都出版超过一百五十篇文章,70年代更是出版的高峰期,近二百五十篇,其中60至80年代的《红楼梦》讨论几占过半篇幅。90年代,红学研究大幅度滑落,但仍占五分之一的比重。

《红楼梦》的确是香港古典小说研究中一个最集中的课题,60

至80年代,引起的海内外论战极一时之盛。牵涉在几个论辩旋涡中的主要作者有潘重规和由他带领的《红楼梦》研究小组、赵冈、徐复观、余英时等,加入讨论的有柳存仁、周策纵和四近楼主等。他们分别在《明报月刊》(主要是徐复观与潘重规/小组之论争)、《南北极》(徐复观与赵冈之论争)和《中华月报》(潘重规与余英时之论争)上往返讨论。此外《广角镜》(吴世昌与梅节之论争)、《中报月刊》(周汝昌在第五期发表文章,成为后来《广角镜》论战的火头之一)和《七十年代》(1979年6月梅节发表文章批评吴世昌,后来论战转到《广角镜》)等刊物亦一度成为国内学者笔战的战场。红学家们攻其所攻,辩其所辩,文词辛辣,战况很是激烈。

《红楼梦》在乾隆年间问世,自清末以来,它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争议最多的作品,在作者、版本、批语、创作用心等问题上都有无数论争。在香港,60年代以来,红学论争主要是索隐与考证之争,70年代余英时发表了《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和《〈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同见于《中文大学学报》1974),陈炳良发表了《近年的红学述评》(《中华月报》1974.1),又有了考证研究与文学批评研究之争。事实上红学研究范围浩如烟海,各派分歧很大,而研究方法可说是红学论争的重要源头,俞平伯1986年11月在香港的演说词《索隐与自传说闲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明报月刊》1987.1)说的正是各派在研究资料与方法上的主要分歧处。

潘重规是香港红学索隐派的重镇,他领导由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选读“《红楼梦》研究”的学生组成的《红楼梦》研究小组,由1967年4月到1973年7月出版了共十辑的《红楼梦研究专刊》,柳存仁形容它是“此近岁海外研究红学之一重要文献也”(第十辑《读红楼梦研究专刊第一至第八辑》)。书中有小组撰述的关于版本、作者、主旨、语法及内容分析等讨论,也有小组以外其他海内外研究者的文章。总的来说这是香港红学索隐派的主

要出版基地。1971年12月徐复观曾以笔名在《明报月刊》撰文批评小组研究方向,小组代表申辩,赵冈后来加入讨论^①。一场论战,沸沸扬扬。

赵冈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是著名的红学考证专家,1970年与其妻陈钟毅出版《红楼梦新探》(文艺书屋1970),六七十年代,他在《明报月刊》、《南北极》、《中华月报》、《祖国周刊》、《纯文学》和《红楼梦研究专刊》共发表了十四篇文章,谈论《红楼梦》的考证问题,并分别与徐复观、潘重规和余英时作往返之讨论,其中《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明报月刊》1976.6)是针砭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而余则于1977年2月至5月一连四期在《明报月刊》以“《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兄”为题答论。余英时认为他的两个世界论并不与自传说处对立地位,但红学革命寻求新典范,可参考西方文学批评的观点,他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的提要中说:“真正的红学革命还得要另辟新途径,找寻一个新典范。关于《红楼梦》有一个奇异的矛盾现象:即《红楼梦》在普通读者的心目中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小说,然而在百余年来红学研究的主流里却从来没有真正取得小说的地位。在新典范之下,《红楼梦》必须争回它原来的小说身份。其次,必须根据全书的中心思想,强调作者的本意和小说内在结构二者的有机性。新红学研究不必倚赖外援,必须从边缘问题回向中心问题,不必排斥历史的考证,但却应属于广义的文学批评的范围。”

^① 1971年12月徐复观以“王世禄”的笔名在《明报月刊》上发表《由潘重规先生“红楼梦的发端”略论学问的研究态度》,小组汪立颖在1972年2月以《谁“停留在猜谜的阶段”?》为文反击。赵冈同期撰文要作者以真姓名示人,结果徐于1972年4月以《敬答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汪立颖女士》一文作答,小组另一成员蒋风再在5月发表《吾师与真理》驳斥之。